

# 人文學、古典學、神學

——第八屆“神學與人文學”

暑期國際研討班會議綜述

Liberal Arts, Classical Studies and Theology:  
Review of the 8th Summer Institute  
on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陳 敘

CHEN Xu

## 作者簡介

陳敘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後

###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CHEN Xu,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School of Liberal Art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mail: xchend@sina.com

## Abstract

The Eighth Summer Institute on Theology & Humanities was held in Suzhou from August 28-31, 2012. The Summer Institute was co-sponsored by the School of Liberal Arts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Christian Culture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nd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The theme of the 8th Summer Institute was “Liberal Arts, Classical Studies and Theological Resources”. Ten distinguished scholars from University of Newcastle (AUS),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UK), University of Glasgow (UK), Lafayette College (USA), University of Stirling (UK),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and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ttended the Summer Institute and gave lectures to young Chinese scholars from universities across China. Nearly 50 young teachers from more than 30 universities submitted papers and participated in it. This paper is a review of the lectures delivered by the scholars from home and abroad, and tries to present the main themes,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Summer Institute.

**Keywords:** Theology and Humanities; Liberal Arts; Classical Studies; Theological Resources; review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於2012年8月28日至31日在蘇州舉辦了第八屆“神學與人文學”國際研討班，主題為“人文學、古典學研究及神學資源”。此屆研討班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耿幼壯教授主持，海內外高校和研究機構共有近60位學者提交論文並參與討論。來自北京大學的趙敦華教授、香港浸會大學的費樂仁（Lauren F. Pfister）教授、澳大利亞紐斯卡爾大學的羅蘭·博爾（Roland Boer）教授、香港中文大學的李熾昌教授、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的特雷弗·哈特（Trevor Hart）教授、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的大衛·賈思柏（David Jasper）教授、台灣中原大學的曾慶豹教授、美國拉斐特學院的埃里克·齊奧爾科夫斯基（Eric Ziolkowski）教授、英國斯特林大學的安德魯·哈斯（Andrew Hass）高級講師、中國人民大學的耿幼壯教授應邀發表大會主題演講，從“批判”、“否定”、“回歸”等諸多方面析毫剖釐人文學、古典學與神學。諸場報告頗具創見，極富啟發，特綜述如下。

## 一、“批判”古典學

現代古典學多指關於古希臘羅馬文本的語文學研究（philology），而這一學科在誕生之初卻專指針對中世紀“學問”（doctrine）的批判藝術。北京大學趙敦華教授在題為《古典學與宗教改革》的報告中舉例闡明以上觀點，比如，最早將人文學研究方法用於《聖經》的校勘研究並主張宗教改革的是現代拉丁文古典學創始人瓦拉（Lorenzo Valla）和希臘文古典學創始人愛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路德與愛拉斯謨的“《聖經》啟示是否服從古典學的考察”之爭，爭論焦點為：1、《聖經》的文字意義是可

疑的還是確定無疑的？2、《聖經》解釋的權威是希臘人還是上帝自身？3、人何以能夠確信上帝的啟示？趙教授認為，前者終因輕視古典學考證而無法長遠影響學術思想，後者則以古典學的回答奠定了後世聖經批評運動的基本立場。曾研習古典學的加爾文不僅能利用其豐富的古典學知識解釋《聖經》，而且可以據此駁斥違背基督教信仰的觀點。在趙教授看來，古典學這一原初的批判姿態，衍生出《聖經》解釋中的高階批評（High Criticism），孕育了天主教“理性成全恩典”的傳統，確定了信義宗“啟示在《聖經》批評之中”的走向，並促成了改革宗“無誤的啟示與可錯的解釋相一致”的信仰。在葆養古希臘—羅馬文明之外，古典學對於神學的批判可視為一種“反轉”的葆養。正是這種“反轉”的使命，古典學的發展才具有更多面向和可能。

香港中文大學李熾昌教授的《經典之形成與詮釋：重讀希伯來聖經之創世與洪水故事》恰可為趙教授的報告做注腳——用古典學的方法進行《聖經》解釋的高階批評。李教授指出宗教經典之形成源自生活、言說、書寫。他以《希伯來聖經》為例，說明何謂開放性的宗教經典。許多人認為一神宗教的正典如猶太教的《希伯來聖經》、基督教的《新舊約聖經》、伊斯蘭教的《可蘭經》等，自寫定經本及確定為正典之時，經典即已關閉，文本之闡釋也被固定為金科玉律，不可刪改。但《希伯來聖經》向我們展示：宗教正典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從未將文本闡釋之路封閉，其文本之適應性、可塑性及開放性，仍然隨處可見。

李教授在演講中示範如何將傳統教義放下，用文本中（what is in the text?）、文本後（what is behind the text?）、文本前（what is in front of the text?）三種取向解讀（Close Readings）《創世記》第1至11章，探討洪水神話的意義。首先思考：《創世記》中有幾個洪水故事？上帝的名稱在敘述中的改變？諾亞幾次被要求建造方舟？到底有多少動物被帶入方舟？……進而說明《創世記》洪水神

話的不同源頭（比如《阿特拉哈西斯》和《吉爾伽美什史詩》），不同的底本之間有矛盾也有銜接。最後，得出結論：《創世記》洪水的敘述者在模仿和搜集各種古代近東洪水神話的同時，將其重新組合表達自己的觀點，意在重構以色列的民族身份。

由此，李教授嘗試用“跨文本閱讀”的方法開放《聖經》文本的闡釋之門：基於讀者的多元經典處境，結合本土文本（亞洲文本）與外來文本（《聖經》文本），比如，在中國的思想語境中閱讀《聖經》。合觀中國豐富的洪水故事（多達 568 個版本）與《創世紀》洪水神話，可發現中西文化的一致之處。李教授認為只有結合本土的經典資源，吸取佛教本土化的經驗，《聖經》的東方之旅才會更為順利，否則仍不免被視為西方經典、外來宗教。

李教授的演講基於這樣一個前提，即神話和歷史並非虛幻和現實的對立。在古代編史中，神話的歷史化或歷史的神話化非常普遍。無獨有偶，澳大利亞紐斯卡爾大學羅蘭·博爾教授在演講中也強調了神話的二重性：虛構（fiction）、深層真理（a deeper truth）。其《論古典主義之神話》（On the Myth of Classicism）關注的是“古希臘經典乃西方文化之根”這一神話（myth）是如何在 18 世紀末、19 世紀初被建構的？這一神話緣何得以建構？博爾教授指出為尋求基督教神學之外，獨立於東方（埃及、印度、中國）的源頭，歐洲開創了以進步、理性、民主的古希臘為研究對象的古典學學科。這一學科的設立，不僅有助於西方世界“研究自身，解釋其自身功能，更好地把握已經發生的事情”，同時也將原有的學科從神學與教會手中解放出來。古典學一經設立，西方文明之根不再是《聖經》與神學，取而代之的是古希臘經典；上帝帶給人類的原初啟示不再是基督神學，取而代之的是古希臘哲學。神學與整個西方文明必須在古希臘的背景下重新闡釋。由是，通過替換歷史、更新敘事，晚於東方登上世界舞臺的歐洲終於在 19 世紀成為世界的中心。在他看來，重尋西方文化之根的努力可謂一個神話——雖事出虛構，卻

又揭櫫了深層真理。深層真理究竟是什麼，博爾教授在演講結束時指出：深層真理就是西方文化之根原本在西方世界之外（穆斯林世界、非洲甚至中國），創建面向古希臘的古典學學科實乃對西方文化的背叛。

此外，香港浸會大學的費樂仁（Lauren F. Pfister）教授在題為《人文學、古典學及神學資源：現當代跨文化處境下的詮釋個案研究》（*Humanities, Classics and Theological Resources: Interpreting Case Studie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ross-Cultural Contexts*）的演講中，以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顧賽芬（Séraphin Couvreur, 1835-1919）、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三位中國經典的外譯者為例，從出版歷史寫作學（grammatological）的角度分析理雅各的漢學古典譯作，並據此對比三人的翻譯及出版情況。費教授在演講中從“選取、使用權威、標準的漢文版本”、“使用標準譯音、特殊聲調記號”、“用數位給權威文本的內容編號”、“雙文之下又作評注”、“對傳統注疏的研究”、“疑難之處，予以批判性解讀與意譯”、“在評注中提供不同翻譯”、“對引文出處的準確定位”、“探索不同的譯法”、“進行儒耶比較方面的分析”、“尋找詮釋原理”、“製作帶注解的參考書目”、“參考文獻中透露歐人的有關研究”、“為‘古典漢語術語’造辭典”、“為所有經典做索引”等 15 個方面呈現理雅各如何為漢學譯作樹立標竿。

西方的古典學在創建之初便以批判姿態參與《聖經》解釋，使其逐漸從封閉的宗教正典身份中抽身而出。古典學不斷批判且葆養《聖經》研究，傳教士漢學家進而兼采兩種研究之長，以譯注中國經典的形式，補充並發展東方的“古典學”。時至今日，《聖經》解釋更拋開傳統教義，吸取他山的本土化經驗，結合東方“古典學”以達成“跨文本閱讀”。這條學術發展之路也許蘊藏著某種有待發掘的深層真理。

## 二、“否定”人文學

古典學是人文學的一個重要分支。相對於神學（Theology）而言的人文學（Liberal Arts），其研究對象是人類的情感、道德和理智。英美學術界近年興起的經文辯讀（Scriptural Reasoning）實踐，其訴求之一就是利用“更優質的分歧”在和諧、平等、自由的對話中實現人文學的一大鵠的——培養公民品德。

與之不盡相同，楊慧林教授將經文辯讀與“中國處境下的文學與宗教跨學科研究”聯繫起來，視之為一種深刻的、超越“宗教”本身的跨學科實踐。這種經文辯讀更為開放地批判形而上傳統——西方宗教和神學概念本身。楊教授認可並讚揚西方傳統中的“否定的思考”，受此啟發，英國斯特林大學安德魯·哈斯基於否定詮釋學的方法，在題為《否定的詮釋學與“經文辯讀”》（Negative Hermeneutics and “Scriptural Reasoning”）的報告中討論中西兩種經文辯讀方式之間的差異。

在哈斯看來，現代以及後現代對形而上學的挑戰啟動了西方哲學與文化思考的否定傳統。否定的思想在亞伯拉罕信仰傳統中隱約可見：《創世紀》中上帝自混沌創造世界。《傳道書》中智慧的虛空色彩、《腓力比書》中基督自我傾空式的虛己。然而，中國以及大部分希臘影響之外的東方傳統中卻並非如此。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關於“無”、否定和悖論的思想。陰與陽相互交融，並非截然對立，而是相輔相成。比如，《道德經》云“正言若反”、“無中生有”、“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若以“道”取代“理性”或“思辨”（Reason），“經文辯讀”這一名稱將富有不同含義。這種“Scriptural Tao-ing”也將引出一整套不同的預設前提、質疑和文化實踐。

哈斯認為以西方哲學、神學和批評思想整合否定的思想，可使“否定”在跨學科、跨文化研究中發揮作用。黑格爾是第一位肯定否定之作用的現代哲學家。他的著名術語“奧伏赫變”

(Aufhebung, 揚棄), 描述了對立元素交互依存 (cohere) 的過程。對黑格爾來說, 唯有通過否定的手段過程才能推進。否定一直且永遠在運作, 永遠鮮活, 即便它成為一種反對自身的否定力量, 一種否定之否定。不少當代思想家如德里達、阿岡本和齊澤克對黑格爾的重新思考多少與否定有關, 他們將黑格爾的否定看成其“體系”的本質, 試圖解答糾纏西方理性主義很久的困惑——否定究竟有沒有任何“肯定”的作用的可能性。

以法國思想家南茜為例, 哈斯接著分析了其對奧伏赫變的解讀。南茜認為奧伏赫變總是在自我批評、否定又肯定 (sich aufheben), 也就是說, 這個詞也運作於自身, 總是揚棄自我 (self-sublation)。它不斷從自身滑走, 在接近自我的同時疏遠自我。這意味著它在任何文本、任何話語系統中起著大破壞者的作用, 通過清除文本和篇章的含義空間來製造斷裂。奧伏赫變不是庇護荒謬, 也不是棄絕意義, 而是在消耗 (exhaust) 含義。奧伏赫變有可能運作於西方宗教內部, 特別是基督教內部。它從內部解構一神論和基督教, 但這並非上帝或者基督教的終結。南茜指出在現代性晚期, 通過不斷自我揚棄、辯證地運作奧伏赫變, 西方的上帝或者宗教有必要敞開自我, 朝向一種不同的信仰和希望, 不再需求一種需要確定性基礎的、形而上的擔保人和被擔保人。

因此, 要求新的信仰和希望の經文辯讀並非一種有神論或無神論思辨, 而是一種被哈斯稱為詮釋學的跨學科思辨。因為, 在否定現身之時, 意義不斷被消耗, 然而否定並不止於消耗, 還會引發靈感。否定的詮釋學是一種壓迫和保留意義的吸納與吐出, 消耗與激勵並存的聯合。在他看來, 黑格爾和南茜所主張的奧伏赫變之下的“思辨的理性”, 更接近“道”, 而不是柏拉圖、蘇格拉底或者啟蒙傳統的理性主義。可以說, 否定詮釋學是一種“道”的詮釋學。

卡爾·雅思培爾斯 (Karl Jaspers) 將西元前 800 年至前 200 年人類空前的創造性時期定義為軸心時代 (axial age, die



Achsenzeit)。據此，有學者將我們這個時代詮釋為“第二個”或者“新的”軸心時代。美國拉斐特學院埃里克·齊奧爾科夫斯基教授在《軸心時代、比較的時代及宗教與文學之比較研究》(The Axial age, the age of Comparison,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Religion and Literature)的演講中認為這一比附似乎不妥。第一個軸心時代的概念之所以成立，正因為當所有那些“突破”(Durchbrüche)齊頭並進之時，某種全球通信和網路系統並不在場，而界定我們這個後現代社會的恰恰是它們的在場。齊奧爾科夫斯基教授提出兩點意見。首先，最重要的經文幾乎都產生於軸心時代，因此軸心時代理論將為楊慧林教授的“經文辯讀”式的跨學科研究(神學、宗教、文學)提供豐碩的基礎；其次，應定位我們的時代為“比較的時代”。通過探討軸心時代、“比較的時代”以及宗教和文學的比較研究，齊奧爾科夫斯基教授進一步分析比較文學與比較宗教學的歷史與現在的神學困境，指出比較主義在20世紀從尋求相似性轉移到強調差異性，分裂自我以與“他者”艱難對話，然而，對於宗教和文學的比較主義研究來說，最好的道路也許在“世界猶如他鄉”與“無人是陌生人”——相克相生的差異與相似——他者與自我的模糊邊界之間。

《瓦格納事件》是尼采寫於1888年的一本小書。尼采在書中將過去好友瓦格納視為一個“事件”，否定他及其代表的浪漫主義，認為瓦格納的頹廢音樂是歐洲近代文化疾病的症象。“瓦格納事件”同時也是尼采對自身的一種否定，有學者視之為“我們歷史的必要轉折”中一個不容忽視的事件。中國人民大學耿幼壯教授在題為《諸“瓦格納事件”——音樂的審美—政治學》的講演中指出，經過一段時間的“遺忘”之後，自1990年代以來，當代西方思想界似乎使瓦格納再次成為一個“事件”，近年來不少學者對此發表看法。為回答作為“事件”的瓦格納何以不斷成為論爭對象以及這一“事件”的人文學、宗教學蘊含，耿教授逐一介紹了參與這一

“事件”的阿多諾（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拉孔-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巴丟（Alan Badiou）、齊澤克（Slavoj Zizek）諸家的觀點。

在諸“瓦格納事件”中，值得注意的是現代音樂與否定性哲學之間的關係。例如，法國哲學家巴丟在《關於瓦格納的五個問題》的第二章中，就詳細討論了阿多諾的《否定的辯證法》中涉及的非同一性經驗、身體、苦難、奧斯維辛與音樂之間的關係。如果奧斯維辛之後的哲學“應該是一種非同一性的哲學，一種否定辯證法的哲學”，那麼，音樂在奧斯維辛之後的歷史境遇中，同樣也必須具有這樣一種否定性，也必須擺脫同一性的支配，必須全然處於差異和轉化之中。這就是所謂的“musique informelle”——一種破碎的音樂。誠如尼采的貶抑，瓦格納的音樂就是這種破碎的音樂的先驅。齊澤克則指出瓦格納所做的一切是在試圖釋放卡在喉嚨之中的聲音，擺脫無法將自身外在化的焦慮。在《瓦格納事件》中，尼采指明瓦格納所開啟的是一條拋棄音樂本身的道路——徹底打破和推翻傳統調式音樂。現代音樂通過各種手段所努力嘗試的正是這種“瓦格納之路”。諸種嘗試頗為有力地呈現了上述無法擺脫的焦慮。齊澤克的洞見在於：現代與傳統之間差異的無限延異徹底否定了形而上學那不斷返回自身的統一性概念，從而也就拒絕了與大他者之間的對話和聯繫，也就是齊澤克所說的，“不僅是瓦格納，就是其最激烈的批評者尼采自己也未能堅持這一立場。……即，其沒有能力接受大他者之不存在”。

自我與他者之別是比較的基礎，卻又是它的障礙。人文學在致力於觀察、分析及批判人類的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同時，其附屬工作之一就是在不斷的比較之中，肯定或否定人類的參照物——大他者的存在。對於逍遙乎“無”與“道”之間的中國文化而言，大他者似乎從來不是一個問題。人文學發展至今，幾經中西碰撞，是否有助於人類提高——接受這個無所不在的大他者的不存在、勇於拒

絕與之對話和聯繫——的能力？抑或只有運用“道”或者奧伏赫變之下的“思辨的理性”，揚棄自我，甚而否定人文學本身才能否定大他者的存在？否定人文學的後果是什麼？可能是，回歸神學嗎？

### 三、回歸神學

英國格拉斯哥大學大衛·賈思柏教授的主題演講《重返神學思考》(Returning to Thinking Theologically)以湯瑪斯·默頓(Thomas Merton)的《莊子之道》(1965)為例，說明植根於信仰的話語在全然不同源的話語中尋求相似或“模仿”，這正是所有真正的跨學科行為的本質。賈思柏教授指出學者、專家，或者宗教人士，甚至政治思想家，必須承認自身的不足，假定自己毫無文化上和智力上的準備，進而勇於在既無知識又無經驗的語言、哲學思想、本體論、音樂領域中發現和諧。與抽象相對的文學形式(比如《莊子》與《聖經》中的寓言、故事、謎語或歷史記述)通過神聖而又恍惚稚愚的論點，旨在激發思考、動搖假設、挑戰理性與常識，儘管在其思想深處潛藏的其實是強硬而不妥協的現實主義。這就是默頓認為《聖經》的《傳道書》與中國的道家經典最為接近的原因之一。默頓對莊子的思考將我們引向一種更為根本的思辨方式，即反觀自身，這種思辨方式也存在於《聖經》預言式書寫，以及神秘主義傳統之中。它要求拋棄二元對立以及價值、洞見、道德賴以存在的基礎，即反對善惡、是非之分，比如，莊子“朝三暮四”故事中的“聖人和之以是非”，又如老子那句貌似悖論的名言“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

賈思柏教授認為基督教思想家莫爾特曼和孔漢斯太過宗教化，以至不能保持恰當的神學邏輯。實際上，正如《以賽亞書》所示，只有當作為前提的信仰被拋開時，真正的共通性才得以恢復，這種

恢復雖往往表現為“反轉”（perversity），但實際上卻形成了更深刻的神學邏輯，其中“神的地位”（the status of the *theos*）至少成為嚴肅的辯論問題。借助這種神學邏輯的恢復，我們開始回歸古代文本——《希伯來聖經》和中國經典，二者擁有近似的古代傳統，它們的智慧和推理模式也許並不相距甚遠。由是，賈思柏教授以道家的“無為”（並非根本不活動，而是合於天地之道的“完美的行動”）比對希伯來先知的思想——雅威的在場/缺席以及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的“上帝既是一切也是虛無”（everything and nothing）之說。當齊澤克式的左翼思想家的“反轉”作品與古代中國的智慧相遇之時，一種更加古老的理性真理被偶然瞥見，這種理性真理果真能拯救當代政治、倫理困局？古代中國的文學與哲學與古代希伯來經文中的智慧幾乎發源於同一歷史時期（約西元前 800-200 年）。每一種文化各有一種深刻的神聖感。然而，這就是孔子與以賽亞的水火不容之處嗎？上帝一直就是那個問題嗎？或者經文辯讀有賴於一個悖論，或許是一個“反轉”，即基督教所說的上帝之死、上帝缺席，這一“反轉”是否也以其獨特的方式出現在莊子的吊詭和令人炫目的文字遊戲中？在提出以上問題後，賈思柏教授給出結論：拋開信仰的前提，恢復神學思考對於東方和西方都十分重要。追隨莊子，追隨以賽亞的雅威，從弱思想的哲學的開始，回歸神學。

回歸神學是西方學術界近年來的一大動向。台灣中原大學曾慶豹的《阿岡本思想中的古典（神）學資源》注意到阿岡本（Giorgio Agamben）近期思想中愈加明顯的政治神學關注——回應施密特（Alfred Schmidt）史密特的政治神學（例外狀態）的相應，認同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彌賽亞思想。這種關注使其與神學之間保持著富於創新性的清晰而又模糊的關係，概言之，即回到古典（神）學之中尋找論述的起點。曾教授在演講中回溯阿岡本最具代表性的著作《牲人》（*Homo Sacer*），探究他的問題是什麼，討論後來的著作為何不斷回到古典（神）學之中，比如，《帝國與榮耀》

(*The Reign and the Glory*)、《語言的神聖性》(*The Sacrament of Language*)、《裸體》(*Nudities*)。曾教授還介紹了阿岡本在保羅及相關神學研究中，是如何回應當代政治話題的。

英國聖安德魯斯大學特雷弗·哈特教授在《聖靈降臨之後的對話？對詮釋學意向的神學冥思》(*Conversation after Pentecost? Theological Musings on the Hermeneutic Motion*)的演講中，親自實踐了如何在研究中恰當地進行神學思考。任何翻譯或詮釋都是在自我與他者的邊界之中冒險。當重新想像聖靈降臨時，為避免這種冒險，應將其視為象徵自我(self/same)的超越與完成，而並非他者(ootherness)的消除。基於這一思路，哈特教授首先闡述文化與對話之間的關係，指出在跨文化背景下，對話既是有趣的，也是冒險的。其次，探究意義與現實之間的聯繫，討論意義與現實、真理之間是否可以分離。再次，強調溝通的崩潰(communication breakdown)，即符號滑失(the slippage of sign)，是對話面臨的又一風險。最後，分析“道成肉身”(incarnation)的奇特邏輯——通過想像策略，無條件與作為他者的他者(the other as other)嚙合，冒喪亡之險傾空自我，堅信得以藉此矛盾地完成自我並真實地面對其特有身份——這就是哈特教授認為的跨文化、跨學科對話中的基督教邏輯。

跟隨著十位主講人，本期暑期國際研討班重溫古典學使命，辯讀洪水神話，揭櫫學科設立的深層真理，領略漢學譯作的原貌，會通中西否定詮釋學，定義“比較的時代”，梳理諸“瓦格納”事件，倡議“重回神學思考”倡議，關注政治神學資源，探討對話與“道成肉身”。以上種種跨文本、跨學科和跨文化的深層互動，不僅為中西經文辯讀提供了實踐機會，也促使與會者不斷探索人文學內含的自我“否定”和“反轉”精神，並回到更深刻的神學邏輯之中去思考人文學與神學的共通之處。經由古典學的“批判”與葆養，人文學與神學的複雜關係在反覆的相互觀照中得以澄明，這不僅是本屆，也是歷屆“神學與人文學”暑期研討班的標的與旨趣。